

互動語言學三人談*

A triologue o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 方 梅、樂 耀、方 迪

方梅：感謝《澳門語言學刊》的邀請，使我們有機會在期刊的專門欄目中，談一談近二十年來日漸受到關注的互動語言學（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互動語言學將語言視為社會交際的重要資源，主張面向互動交際中自然發生的語言，立足於言談參與者的互動過程進行實證性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語言的各方面（韻律、形態、句法、詞彙、語義、語用）是如何在互動交際中被塑造的；另一方面研究社會交際行為、交際意圖是如何通過語言及其他多模態資源（如眼神、手勢、身勢等）實現的。回想起來，這個研究領域的興起和發展有幾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第一，2001年，Couper Kuhlen 和 Selting 主編的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首次將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作為一個術語和學科名稱提出。其核心宗旨就是將語言的結構及其運用看作互動交際的必然結果，涉及會話韻律、語法與互動、語言的語境建構等多個領域。而話語功能語言學家、人類語言學家與會話分析學家的學術融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

始了，1996年出版的 Ochs、Schegloff 和 Thompson 主編的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就是代表性的成果。

第二，2014年，國際語用學雜誌 *Pragmatics* 推出專刊 *Approaches to Grammar for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對互動語言學做出了理論探索。2015年，Thompson、Fox 和 Couper-Kuhlen 三位的 *Grammar in Everyday Talk: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 對互動交際中回應語的語法格式進行了專題研究。

第三，201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Couper-Kuhlen 和 Selting 的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對二十多年來互動視角下的語言研究的理論、方法和重要的成果做出歸納和總結。2021年，學術期刊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創刊，由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出版。

另一方面，語用學研究話語如何在情境中獲取意義（Leech 1983）。從1995年 Thomas 所著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的出版，到近年來推出的 *Handbook of Pragmatics Highlights* 系列叢書中設立的分冊 *The Pragmatics of*

*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重大項目“漢語自然口語對話的互動語言學研究”（20&ZD295）資助。

Interaction，以及歷史語言學家對話語標記產生機制的研究和關注，都顯示了語言互動性研究的廣泛拓展。

當然，互動語言學的研究並非憑空而來，從理論背景和方法論來源看，既有會話分析學派的影響，也是話語功能語言學的新拓展。

樂耀：是的。在方法論上，互動語言學研究深受會話分析學派（以下簡稱 CA）的啟發。而 CA 植根於對話互動的實證研究傳統，這源自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 1963, 1967）創立的“常人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的社會學理論（Heritage 1984）。這種方法的主要分析假設是，社會互動是由互動者自己不斷構建和理解的，而不是預先給定的，對其解釋離不開社會背景。也就是說，社會互動及其社會秩序是不斷浮現的（emergent）；參與者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有關意義的形成過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所有符號線索的語境敏感性，或者用常人方法論的術語來說，即索引性（indexicality）。

在常人方法論的社會學理論的影響下，CA 學者認為社會互動是有序的、成系統的，語言是用於互動的資源，在特定的會話環境中，交際者用它來實現適當的社會行為。因此，會話分析不應該從社會互動中分離出來，互動是有結構組織的，這種組織的痕跡可以在互動本身中找到。同時，會話分析也不應該置於互動上，而應從會話參與者的視角選擇進行分析的範疇、單位來解釋。會話分析學家是要試圖將每一次社會言談互動展現為互動參與者共同合作的活動。

因此，互動語言學者與 CA 研究者都特別強調實證研究，它的一系列分析都是基於對音訊或視頻的真實言談記錄。

方迪：樂老師談到的常人方法論對於理解互動語言學的理论背景和方法特色非常重要。Sacks

（1984）就曾指出，常人方法論是一種自然觀察的科學；它通過對會話的大量收集、細緻觀察，使會話的社會組織可見，從而歸納並描述會話事件。此前的社會學理論將日常行為組織歸因於獨立的文化或社會結構，而常人方法論採用“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路子，將社會組織看作社會成員在特定情境下協同付出而浮現的產物，對話交談在社會建構的研究中就處於核心地位。基於常人方法論的互動語言學同樣將互動交談（talk-in-interaction）作為其研究對象。所謂 talk-in-interaction 是發生在具體互動場景當中的，既包括日常自發的交談——一般稱為 daily conversation 或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也包括各種專門機構場景中的談話，即 institutional talk，比如課堂互動、零售交易、醫患溝通、新聞採訪、導遊參觀等。

樂耀：互動言談語料能從會話序列結構展現參與者取向的研究視角，它反映了資料的有效性和自然性。正如 Schegloff（1996: 53）所言：“在日常會話和其他形式的言談互動中，會話中的話輪序列是重要而貼近的互動組織結構的‘生態龕’（the key proximate organizational niche），它是語言使用和適應的環境。”這裏的“生態龕”（也叫“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是借用生態學術語，指一個物種所處的環境以及其本身生活習性的總稱。而語言的生態龕是社會互動交際，這是它的使用環境，其具體的使用模式就是一輪一輪的言談互動序列。因此，來自實驗環境產出的或來自內省的資料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對話互動參與者的實際行為。

方梅：對材料的要求是研究理念決定的。互動語言的研究強調在線產出，必然更加關注對話過程，關注對話中言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關注會話慣例（practice）以及產出過程中的多模態協同效應。

樂耀：關於研究理念我認為兩點很重要（參看

樂耀等 2022)。第一，對提出的任何分析範疇和主張都要從參與者取向來論證。當分析者想要論證某些語言特徵是構成一個特定話輪或序列的重要因素時，就需要證明會話參與者自己也將其視為重要因素對待。不能僅依靠分析者的直覺或者心理猜測，應該依賴參與者取向的論證原則。這樣才能夠確保所描述各種模態資源（包括語音韻律、詞彙語法等資源，以及手勢、身姿等）的使用慣例對參與者自身具有某種現實意義，並且這是參與者語言能力的一部分。第二，確保個案的分析解釋和個案集合的分析解釋一樣具有說服力。任何單一的交際事件都是參與者在進行互動時，綜合使用一系列交際慣例（各種模態資源）的結果。但是，互動現象的個案研究不是孤例研究。要通過仔細考察相似的、複現（recurring）的個案總和（the aggregate）來概括互動現象的語言手段或語音韻律模式，這樣才能發現互動結構和語言資源之間的關係。

方梅：2018年在第三屆互動語言學與漢語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之後，我們在北京語言大學舉辦了一個專修班。在專修班上，有學員提問說，互動語言學強調使用真實發生的自然口語對話來研究，分析口語時也有大量的會話分析術語。那麼它與會話分析有什麼不同？這恐怕也是很多人會提出的問題。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之所以是語言學，因為它的目標還是探討“形式—意義—功能”之間的關係。只不過，從形式看，互動語言學不僅關注語言表達方式，也關注交際中的所謂“副語言”，並且都看作互動資源；把對於句法形態、句法範疇等語言學關注的問題放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去考察。既要看產出的形式，也要看產出的過程（也就是序列）。而“意義”解讀不是基於孤立的詞彙或者句子這樣的靜態產品，而是要放在具體的互動行為之中。“功能”是基於言談參與者在特定互動行為下的交際意

圖。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像陸鏡光先生強調的，互動語言學是“語言學”。

方迪：從研究目標來說，互動語言學探討語言何以如此，如何解釋語言廣泛存在的特徵及多樣性（Mushin and Pekarek Doehler 2021）；而其秉承的動態浮現觀和範疇實證觀與話語功能語法是一脈相承的。互動和語言相互影響和塑造，以至於當語法學家將研究視野轉向自然口語對話時，就發現自己已經在探討互動交際行為了（Selting and Couper-Kuhlen 2001）。相比於CA的社會學導向，互動語言學更關注的是採用相關概念和方法如何能夠加深對語言結構、乃至語法本身的理解。在其理論探索中，就有“互動中的語法”（grammar in interaction）、“應互動而生的語法”（grammar for interaction）以及“作為互動的語法”（grammar as interaction）等觀點（參看Laury et al. 2014）。可見，從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回答基本的語言學問題，探討“形式—意義—功能”的對應，是互動語言學始終不變的追求。

方梅：是這樣。近二十年來，研究者對於語言與互動的關係也是逐步深入的。相較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梨子的故事》為語料觀察獨白體篇章中的語法規律，話語功能學家的研究可能更多關注 grammar in interaction。互動語言學研究者提出 grammar for interaction、grammar as interaction，語言觀上更為重視互動過程的作用，越來越看重語言的主體，也就是言談參與者，在互動對話中對語言的塑造。

樂耀：三個提法反映了研究者對“grammar”的認識在不斷變化。想想浮現語法理論，想想“大語法”的理念。互動多模態納入語法範圍，說明研究者拓寬了觀察語法的視野。

方迪：Grammar in interaction、grammar for interaction 和 grammar as interaction 這幾種理念，體現了不同學

術背景的學者研究理念的差異。儘管並非是一個歷史更替的發展過程，但還是體現了語法研究與互動研究愈加深度的融合，或者說在語言觀上愈加激進的態度。Grammar in interaction，就是將互動作為語言結構的語境，根本上二者還是分離的，只是說互動中語法範疇的特徵會跟基於書面語的描寫有所不同。Grammar for interaction，其實 Thompson、Fox 和 Couper-Kuhlen 她們近些年關於建議、提議、請求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出不同的語法格式體現對於當下行為不同的立場，適應於不同的社會互動語境，可以說是體現“語法適應互動、語法為互動（服務）”的觀念。當然，這跟 CA 學者以社會行為為根本點的主張，還是有所不同。Grammar as interaction，就走得更遠一些了。2018 年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雜誌專欄討論過互動中 body movement 和語法的關係。像 Keevallik (2018) 就認為，那些與言語配合的動作，也是語法的一部分，但這樣一來，語法的範圍就擴大了，相當於作為互動的語法。而 Couper-Kuhlen (2018) 則認為，儘管具身動作跟語法有密切關係，但它們不創設句法投射、缺乏充分的規約化表現，且不完全是線性的，因此不應將它們納入語法當中。

樂耀：語言觀直接影響到對語法範疇的認識。事實上，對於語法範疇的分析，並不應當是先驗性的 (a priori)，而應當從真實語言使用中去發現。這種思想早在結構主義時期就有所體現——在布隆菲爾德的 Subject and predicate 一文中，他就明確指出語言分析的原則——“[理解話語過程和語感的] 心智現象應該以實際發生的情況為準，而非作為觀察者在現象之後進行解讀的產品或記錄” (“[A] psychologic principle... which shows the way to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utterance and of the speech-feeling... i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mental

phenomena must be viewed as they actually occur and not as their products of a record of their occurrence may be interpreted by an observer after the fact”，Bloomfield 1916: 13-14）。儘管在語言觀和研究方法上與當今互動語言學存在很大不同，但這種“範疇基於實證”的思想的確與互動語言學的理念不謀而合。

方迪：從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已經開始收集真正互動交際中的語料，也就是“非聚焦式的” (non-focused) 交談。語料採集的總體原則是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完整的交際過程。這與傳統的語言 / 方言調查或是人類學 / 社會學調研有著本質不同。語料採集者需要盡可能地“隱身”，Mondada (2013) 將它描述為“自然的態度”，“自然”指呈現出“材料收錄之前的會話實踐本身”，Garfinkel (1967) 將其表述為“the practices themselves prior to the collecting of data”。為實現這一目標，在語料採集時需要與參與者充分溝通，使其理解研究目的，並取得倫理道德上的許可；採集場所盡量在他們熟悉的環境，在滿足研究需要的同時，設備應盡量小型化，其架設或擺放應具有適應性，以減少參與者的注意，從而降低交談中的自我監控（包括內容和說話方式）。

方梅：是的。語料的採集方法、語料轉寫中記錄哪些信息，這些都是互動語言學的方法論特點決定的。它沒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特定的假設，而是強調從自然產出的互動行為中去發現，從不同的活動類型裏面去發現規律。在這樣某種特定的互動活動中，說話人的意圖是怎樣透過不同的互動資源的協同得以實現的。

樂耀：是的。互動語言學用的是常人方法論的一個視角，完全是語料驅動的，沒有一個先驗的理論假設在那兒。這和傳統的口語語法研究是不一樣的。口語語法它可能更強調語法現象是先驗存在的，

你把這個現象放在口語媒介或者語體中去看這個問題有怎樣的表現，但是互動語言學強調是在互動過程中所浮現出來的一些語言學問題。比如，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產生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交際過程中正好是在這個話輪或者序列中會有這樣的表現，等等。

方梅：另一方面，從語料采集角度說，雖然不像以往語言調查那樣基於調查手冊規定的項目去詢問被調查人，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規劃。比如，充分考慮到不同的互動類型，使語料全面反映不同類型互動行為的表達。所謂的互動類型，跨文化地看，在多數的語言族群裏面有一定的共性，這一點實際上就決定了我們的研究不同於以往關鍵詞檢索的方式，因為那樣你可能會漏掉很多東西——涉及活動類型的問題不是靠關鍵詞檢索能夠掃得出來的，一定是一行一行的去看那些轉寫的材料。

樂耀：對，在語料庫裏打一個詞搜索出很多實例，那是把語言現象同質化了，就是看它的同一性或者規則性的東西。但是在日常交際中的語料更強調的是 *contingent*——偶發性的東西在裏邊所起到的作用，但偶發性不是說它沒有規律，而是說從偶發性的東西中去找反復出現的慣例。

方迪：這種對於偶發性的重視很好地體現了會話分析學者常說的“*Why that now*”。這種研究屬於質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這也決定了經典 CA 研究對單一個案研究（*single-case study*）的重視以及對於大規模定量統計方法的謹慎態度。互動語言學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種視角，並不是說不能有數據統計，而是說這種統計應該建立在具體個案的逐個分析基礎之上。

方梅：互動語言學研究，有兩個方面我們需要了然於心。一方面，我們要看互動語言學是話語功能語言學近二十年來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既看

到它的革命性的一面，比方說，空前重視資源的互動表達功能等。同時，也要看到學科發展的自身邏輯。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Chafe 等學者開始通過口語敘事語體材料（參看 Chafe 1980），比如通過以《梨子的故事》默片的轉寫敘事語體材料做語法研究。從對自述口語材料的研究到越來越多地關注對話。但是，在理論上並沒有離開語言學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一直在試圖回答語言學領域的一些核心問題。大家通過前幾屆互動語言學會議也能夠注意到，比方 Sandra Thompson 等學者關於“小句”交際單位的討論，明確指出名詞短語作為獨立運用的交際單位的地位（參看 Thompson 2019）。再比如，討論始發語和應答語或者相鄰對之間的問答關係，有哪些句法以外的 *practice*（慣例）等等。像 Thompson、Fox 和 Couper-Kuhlen（2015）那本書就指出，應答語不同於始發語，它承接始發行為，並且是被規定了類型的（*typed*）。應答是位置敏感的（*positionally sensitive*）和序列特定的（*sequence-specific*）。違背慣例則構成有標記的編碼方式，有可能帶來附加解讀。與句法（*syntax*）不同，慣例（*practice*）是基於不同序列位置和互動行為的一套規約。單句看“合語法”，實際上是符合造句之法，尤其是書面語中的造句之法。但是，它不等於在對話中符合慣例。這些慣例也是約定俗成的，既具有跨語言共性，也有不同語言的差異性。她們這本書樂耀老師專門介紹過（樂耀 2019）。這些探討都在回答語言學中非常基本的問題。經歷了二十多年，互動語言學的研究具有更為廣泛的跨語言對比視野。在 2018 年劍橋大學出版的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一書中，幾乎每個專題都涉及對不同語言的對比。這種對比性觀察既有 CA 關注的互動行為，也更多聯系句法形式和句法範疇。

樂耀：比如 Luke 和 Tanaka（2016）對比分析英

語、日語和粵語對回應評價行為所使用的詞彙 - 語法手段差異，以及 Mayes 和 Tao (2019) 對比分析英語和漢語交際中分類行為的指稱表達等。再比如，近年來，漢語作為對比語言參與了國外有關話語修復 (repair) 的研究。Dingemanse 等 (2013) 對比討論了來自五大洲的十種語言口語語料，發現小詞 *Huh?* 作為修復開啟語具有普遍共性，並認為該單位的語法地位是一個詞。漢語的“啊？”也是如此。Fox 等 (2009) 是一篇通過跨語言視角研究關於同話輪自我修復現象的文章。作者主要關注修復發起所涉及的話輪及話輪構建單位是否完結的互動位置。其中對比分析了包括漢語在內的七種語言，並解釋七種語言在修復發生位置上呈現出的差異。之後，Fox 等 (2017) 專門考察同話輪自我發起類修復發生在詞內的現象 (即詞法、形態層面)，該團隊對比分析了十種語言在有關該會話現象上呈現的差異，並嘗試根據不同語言的構詞形態特點來給予解釋。遺憾的是，通過對漢語的口語語料中該類修復現象的考察，作者發現漢語並未提供有關詞內修復的證據和理論貢獻。另外，國外還有一些跨語言的互動語言學研究，比如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Stephen Levinson 研究團隊做過多項跨語言的互動語言學課題研究，像話輪轉換 (turn-taking)、問-答相鄰語對 (question-answer pair)、他人發起修復 (other-initiated repair)、互動中的人物指稱 (person reference in interaction) 等，這些成果都沒有涉及到漢語的調查和研究。

方梅：跨語言的對比研究也越來越多，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趨勢。就像語言學的研究，早期關注於像印歐語這樣一些強勢文明的語言。後來，隨着語言類型學的興起，很多過去人們不太了解的那些語言開始受到關注，對語言多樣性的認識，促使語言學研究有了更加廣闊的天地。互動語言學的深

化也是這樣。一旦有這種跨語言的視角，對不同類型的語言觀察，使得與早期 CA 對比，語言學意義的新發現不斷湧現。

樂耀：跨學科也是很重要的表現。也是在馬普所，他們在做和心理實驗相關的研究。比如說他們在統計話輪轉換時長的問題，反應時長的問題，包括我所知道的講 repair，他們在 last-term repair 跨語言的研究相關的也有很多。尤其是在做反應時，話輪轉換的反應時。另外，他們做腦電做 ERP 其實也有很多，也是馬普所的人做的。

方梅：跨學科研究還體現在對多種互動資源協同的觀察。比如韻律和具身動作在互動言談中的表現，等等。在互動語言學研究者看來，以往被視為“副語言”所提供的信息與語言形式的句法同樣重要，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會壓倒語言而對會話的組織結構產生決定作用 (Ford and Thompson, 1996; Couper-Kuhlen and Selting, 2018)。進行中的話輪是一個綜合了各種合作行為的“多模態合集” (multimodal package; Hayashi, 2005)。

方迪：是的，人類交際本身就是複雜的多模態系統。韻律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互動對話中提早回應 (early response, Deppermann et al. 2021) 和他人重複 (other repetition, Rossi 2020) 的專題。其中多項研究表明，話語產出的韻律特徵極大地塑造著其互動功能。“語法—身體”界面的研究關注言語與身體表現的相互詮釋，乃至語法與身體的關係，已經成為一個前沿方向。去年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期刊推出了由 Pekarek Doehler、Keevallik 和李曉婷共同主編的研究專題 “The grammar-body interface in social interaction (社會互動中的語法—身體界面)”，基於不同語言的互動言談探討了多模態行為格式 (multimodal action format)、具身互動中語境敏感的句法、手勢與互

動中局部意義的構建、語言學生態中的身體等議題 (Pekarek Doehler et al. 2022)。

方梅：對於身體 - 視覺資源，比如注視方向、身體姿勢等傳遞的言者意圖或態度，目前已有不少調查。這些多模態表現在不同場景中高頻複現，就可以把它加以歸納和總結。未來各語言做出更多相似研究之後，會發現一些語言特性，以及跨語言的共性等。但至少目前這個階段還是處於一種起步階段。相對而言，韻律在互動交際中的功能研究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成果，Barth-Weingarten、Dagmar 和 Margret Selting 主編的 *Prosody in Interaction* 一書是較早直接討論韻律與互動的專輯。近些年的研究在陳玉東老師最新刊出的文章中有全面的介紹 (陳玉東 2023)。

方迪：漢語方面已經出現不少結合多模態表現的研究。2019 年出版的 *Multimodality in Chinese interaction* (Li and Ono eds. 2019) 對多模態分析用於漢語研究的理論問題、漢語互動中多模態慣例 (如列舉 listing)，以及互動交談中話輪轉接、話輪延伸、修復等的多模態組織進行了探討。去年，陶紅印老師發表了對量級型準分裂結構 (scalar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 的多模態分析 (Tao 2022)。通過對不同“微觀語境” (micro-context) 中準分裂結構的句法、韻律及身體動作表現的分析，探討它的互動功能。

方梅：自從 2014 年首屆互動語言學與漢語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召開以來，互動語言學正式引入中國已經將近十年時間。但互動語言學相關的理念、方法在漢語研究問題中的運用實際上要更早，比如陶紅印老師對漢語基本單位的研究 (Tao 1996)，陸鏡光老師等對漢語話語延伸現象的研究 (陸鏡光 2000、2002、2004a、2004b；Luke and Zhang 2007；Luke 2012) 等等。2018 年，互動語言學第一部系統性專著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出版，我和李先銀、謝心陽發表了述評文章，對互動語言學理念與方法、熱點研究課題以及互動視角下的漢語研究做了總體闡述和展望 (方梅、李先銀、謝心陽 2018)，此後第三屆互動會以及後面專修班的成功舉辦。不少中青年學者加入這一領域，近年來出現了多項以“互動語言學”視角方法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些主要期刊開設互動語言學專欄或專刊，刊登漢語方面相關前沿課題的研究成果。這些情況都說明互動語言學在中國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接納和認可，學者們開始認識到互動語言學理論與方法在面對漢語口語語法事實時的創新價值和潛力。

方迪：目前，漢語方面互動語言學研究我認為有兩大方面的。一是對互動語言學理論或專題領域的闡述與思考，比如樂老師關於會話基本單位的研究 (樂耀 2017b)。同類的成果還包括李先銀 (2020)、方迪 (2020、2022b)、曹佳鴻、張文賢、李先銀 (2022) 等。二是對漢語語法中關注的語詞、結構或範疇的互動視角探索，兩位老師和我自己也都投身其中，比如答句形式與問答關係 (方梅、謝心陽 2021；謝心陽 2018、2021a、2021b)、語言單位的構建與合作共建 (樂耀 2016；關越、方梅 2020；方迪 2023)、特定虛詞的位置敏感性 (如副詞，方梅 2022，陶紅印、高華 2022；連詞，姚雙雲 2018、2022)、指稱策略 (樂耀 2017a；方迪 2022a) 等。

方梅：後一方面尤其值得重視。互動語言學主張將語言植根於對話互動之中，這種對話主義 (dialogism) 的取向是對之前語法研究中的偏重書面語、獨白視角的一種革新 (方梅等 2018)。那麼我們要著力思考的是，互動語言學的視角和方法，能夠為漢語事實的描寫和解釋，提供什麼啟發和幫助；對加深漢語語法特點的認識，有什麼具體價值。你們可以結合具體問題，談談你們的想法。

樂耀：關於這個問題，我以漢語話語延伸現象說一下。縱觀這一現象的研究歷程，不同的研究範式所立足的基本單位並不相同。倒裝、易位、右偏置的相關研究主要是以句子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句子是已經產生出的、靜態的成品。主位後置句的研究則是以主述位信息結構為基本單位。這些研究都主要以說話人的單方視角預設了存在一種正常的、標準的語序結構。因此，這些研究主要從正和倒的順序變化為研究起點，將其視為語用或認知因素影響下的靈活變化形式。追補、話尾巴、延伸句、右緣的相關研究是從言談交際的時間線性上來看語言形式的組織過程，將句子看作言語交際產出過程中動態生成的。這些研究不再預設和強調存在一個正常順序的結構形式，話語延伸也不再被認為是某一種正常結構的變體。基於會話分析和互動語言學範式下的延伸句研究立足於會話的話輪構建單位，對句子的認識不再局限於說話人的單方視角，而將句子視為交際雙方在即時互動中為滿足和適應偶發的局部環境而共建的，是在不斷擴展和修補中實現的模態資源。

雖然從語序的“正”與“倒”探討這類現象對漢語語序研究來說是很好的切入點，但“‘順裝’和‘倒裝’把句子成分的位置絕對化了”（呂叔湘 1979:68）。朱德熙（1985）就已指出，易位句不能還原為被包孕的詞組。可見，易位句終究是語用中的話語現象，只從結構上的“正”與“倒”來觀察並不能揭示其根本性質。這個問題的綜述和更多思考可參看我和學生喬雪瑋即將發表的《話語延伸及相關現象的研究述評及思考》。

方迪：樂老師提到基本單位的問題，確實是很多問題探討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對漢語基本單位的認識關係到漢語語法的全局面貌。趙元任先生提出的“零句說”廣為人知：漢語口語中零句為主，主

謂齊全的整句由零句構成；零句既包括謂詞性零句，也包括體詞性的零句；嘆詞是最地道的零句（Chao 1968: 57-67）。上述關於漢語語法的重要論斷，在互動語言學視野下獲得了進一步深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真實自然口語對話的細緻考察，為漢語零句為本的特點提供了更為具體的佐證。基本單位在會話組織和交際行為上的價值得到進一步關注。比如樂老師對漢語會話中最佳話輪投射單位的探討（樂耀 2016）。話輪構建單位（TCU）的判斷要綜合句法因素和韻律特徵；零句的末了語調可能是延宕（形成“逗”），也可能是停斷（形成“句斷”）；只有具有停斷特徵的單位才具有話輪投射的作用，即可投射後續互動行為，而“非停斷”特徵則是漢語流水句形成的原因。完權（2018）採用 Thompson 和 Couper-Kuhlen（2005）的檢驗標準考察漢語會話，結果同樣得出漢語中零句在語法和互動層面具有可投射性；零句才是語法和互動的根本。“零句說”意味著漢語中單個名詞可以作為完整的交際單位使用，這對基於印歐語的研究——小句結構以謂詞為核心構成了挑戰（參看 Thompson 2019）。

另一方面，透過某些會話慣例，可以揭示更多的語法事實，從而豐富或刷新對現有單位類型的認識。以合作共建為例，對這類現象的考察一方面是對“行進中的句法”的詮釋，另一方面可以揭示特定結構在對於言者的心理現實性（關越、方梅 2020；方梅、胡蘇紅 2023；關越 2023）。漢語零句為本，構句不以動詞為中心；多流水句，語句單位的邊界更多依賴韻律特徵。這些都可能導致漢語合作共建的模式遠遠超出印歐語研究所揭示的範圍（方迪 2023）。透過合作共建這扇窗，從交際者的在線分析可以揭示漢語語句的組織模式、互動相關的結構類型，從而加深對漢語語法特點的認識。

方梅：無論是話語延伸、合作共建這類“特殊”

現象，還是常規的對話過程，互動語言學的研究都對傳統的靜態語句觀提出了挑戰。此外，互動語言學還拓展了意義和功能分析的手段。比如剛才提到的零句，趙先生曾說“嘆詞是最地道的零句”，但是嘆詞形式簡單，功能多樣，在之前的語法研究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互動語言學對這類形式（海外學界一般稱為話語小品詞，discourse particle）在認識、情感、態度表達等方面的作用予以極大重視，秉持“序列特定”和“位置敏感”的理念，並注重產出特徵，使得意義和功能的分析可以通過互動的推進，特別是下一話輪交際者的實際表現加以驗證。再如副詞，我們看到，所謂獨用的副詞也構成零句，它們在互動中的意義解讀同樣受到所在的行為序列以及位置的塑造；語氣詞也可能對獨用副詞的意義加以凸顯和固化（方梅 2022）。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互動語言學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可以拓展漢語虛詞分析的視野，帶來以往研究無法觀照的新認識。

方迪：是的，在我看來互動語言學對語法研究核心的“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都做出了內涵的拓展。“形式”除了包括“構成”（composition），還包括“位置”（position），即會話結構中的橫縱兩維的分佈——話輪（或話輪構建單位）中的位置，以及話輪在序列中的位置；而“構成”也不僅僅是詞彙句法形式，還包括語音 - 韻律特徵和伴隨的具身表現，形成所謂的複合話段（composite utterance）。

“意義”指的是在本義之外，具體互動語境中的意義或功能。這就將視野擴展到社會交際行為的框架下，涉及話語及行為的組織管理，以及特定立場、意圖的交互達成，強調交際者自身對互動偶發因素（contingency）的觀照和聽說雙方的相互識解。

方梅：從總體上看，漢語互動語言學現有研究還是處於起步階段。比如說語料的收集，要能夠充分反映漢語作為聲調語言的特點，語調轉寫方面有

哪些是現有的基於印歐語的體系所不能涵蓋的，這都是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實際上還是在積累和探索的過程中。

樂耀：對。漢語自然會話語料的搜集、採集、轉寫和建庫是最基礎的工作，要不斷加強和推進。一是語料建設的規範和技術問題，包括漢語自然口語語料採集的原則、技術手段的利用等；再一個就是方老師說的，要建立一套適合漢語語言文字特點的轉寫體例規範。語料是語言學研究的源泉，漢語自然言談語料庫的建設尤為迫切，需要同行合力共建。

方梅：是的。首先，要扎扎實實去做語料的調查，一手材料方面的基礎建設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相對於以往基於書面材料的語料庫，相對於海外其他語言的已有口語語料庫，漢語自然口語多模態語料庫，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系統性上，仍舊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要有世界眼光。已有的互動語言學研究已經揭示出一些跨語言對比的成果（參看方梅、胡蘇紅 2023）。我們先得了解其他語言裏已經研究了什麼，有哪些發現。然後反觀漢語，在比較中深入認識漢語的規律。比如，漢語語氣詞特別豐富，這語氣詞的表達功能是在幾個不同層面的，有些是和命題有關的，體現時體信息的，有些就是純粹用作於互動的（方梅 2016）。國外 CA 研究關注比較多的是所謂 turn-initial 的成分，大概與他們在理論初創時期觀察的對象語言多少有些關係。而漢語是話輪一頭一尾的 particle 非常豐富。這種系統性差異特別需要引起重視（參看張瑞祥 2023）。

第三，在互動材料中看句法。一方面，語言的使用者憑藉經驗就知道自然口語比書面語的句法要求寬鬆；另一方面，有一些基本的句法是不可能突破的，漢語說“我的書”不能說“的我書”對吧？

我在 2018 年《浮現語法》那本書討論到語體的時候簡要談過這個問題，但是總體上看還是有很多未知數。2022 年我在《中國語文》上發表的有關獨用副詞的討論就是想說明，即便是口語中的零句，雖然有可能突破基於書面語概括出來的語法，比如副詞是只能做狀語的一類詞，但是並不意味著其中沒有條件限制。只不過這個限制要到對話序列中去找，從互動行為為角度去理解語言表達形式何以如此。再比如，去年《中國語文》上發表的關於漢語自然口語對話中否定疊連現象的研究（李先銀、張文賢 2022），也是這樣。互動語言學研究者注意到語言形式的在線產出具有權宜性和因時性，但是並不意味著可以把口語看作全然沒有約束。作為語言學研究者，不能滿足於“隨文釋義”。如果沒有找到規律，是我們的工作還沒做到家。

樂耀：方老師講的非常重要。這些是互動語言學視角給我們帶來的啟發。我覺得，互動視角的漢語語言學研究應該關注以下幾方面（樂耀 2019）：第一，從社會行為和語法格式的關係角度解釋漢語的特點；第二，從會話序列位置的互動視角反思傳統語言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或局限；第三，從對日常言談過程的研究中來揭示漢語互動的特點。

方迪：是這樣。方老師說的還讓我想到了，現在很多人都在講權宜性，講“位置敏感”，但具體做的時候要特別的謹慎。如果沒有普遍性，只是拿幾個例子來說，就會有“隨文釋義”之嫌。海外的研究有的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比如剛才談到新創刊的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雜誌，第 2 期有一篇以“位置敏感”為題的文章，考察德語當中的“can you”形式（*Kannst du X*）和它配合的具身活動在不同序列環境、活動類型下的變化（Deppermann and Gubina 2021）。內容很新，理念也非常好；但我們會覺得有點“不過癮”的地方——文中呈現的例子

太 particular 了。我們理解它是一種 local、particular 的東西，但也希望得知這個用法的限制條件是什麼？其中的規律是什麼？不僅僅是它可以存在的地方，還包括當它缺失的時候會怎麼樣。所以，我特別贊同剛才老師說的。

方梅：就漢語語法的研究來說，呂叔湘先生、趙元任先生、朱德熙先生等大家都非常看重口語對於揭示語言本質特徵的重要性。呂叔湘先生《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中就說過：“聽人說話，聽了一個詞，根據他的語法和詞彙知識預期底下可能是一個（或哪幾個裏邊的一個）什麼詞，也許猜對了，也許猜錯了，一個個詞順次猜下去，猜測的範圍逐步縮小，猜對的機會逐步加多，最後全對了，就叫做聽懂了。聽完了還不完全懂，這種情況也常見，多半由於說話的人說得不周到。說話也經歷類似的過程，起頭說的時候不一定‘成竹在胸’，而是一邊說一邊挑選字眼兒，說完才算數。”（呂叔湘 1979：103）這就是線上產出的動態眼光。關於句法單位與交際單位，呂叔湘先生在《語文常談》裏談到語音的“句”和語法的“句”時說，“現在講句子是從語言出發。語言的主要用處是對話，一個人一次說的話是一個交際單位，因此不管多短，都得算一個句子。話要是長了，語音上必定有若干停頓。其中有些段落，語法結構上沒有什麼牽連，儘管在這裏是一段跟著一段，在另外的場合卻都可以單獨說，同時，這些段落的末了都有跟單獨一句的末了相同的語調——這樣的段落，一段是一個句子。”（呂叔湘 2008：52）趙元任在《漢語口語語法》裏指出口語裏“零句”是根本，指出 inverted sentence 的本質是“追補”（afterthought），說的也是在線生成的互動性。而西方學者提出自然發生的話語是在線（online）即時（real-time）生成的產物、具有“進行中的句子的句法”的特點（the syntax of sentences-in-progress）是上世

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Lerner 1991)。朱德熙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談到語法研究的對象是什麼的時候，也特別強調了口語的重要性。而口語中韻律與語法的關係問題，趙先生 1968 的書裏隨處可見。林燾先生 1962 年就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探討現代漢語輕音和句法結構的關係 (林燾 1962)。四十年前，林燾先生在北大給本科生上選修課，就帶領我們調查收錄北京人最自然的聊家常，而不僅僅是用調查字表。

所以說，互動語言學在漢語研究中的運用具有特別的意義。從根本上說，它發揚了漢語語言學研究的傳統，並且在傳承中使研究在材料獲取、觀察視角和理論解釋方面更具有系統性，以利於從跨語言角度發現以往基於句子語法難以概括的用法規律，說明哪些語言表現是由於互動因素驅動的，哪些表現是語言類型特徵使然。

參考文獻：

- 陳玉東 2023 互動語言中的韻律表達研究綜述，《當代語言學》第 2 期。
- 曹佳鴻、張文賢、李先銀 2022 漢語會話中的話語疊連現象研究，載方梅、史金生主編《互動語言學與漢語研究》(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
- 方迪 2022a 自然對話中指稱選擇的互動功能，《中國語文》第 2 期。
- 方迪 2022b 互動視角下的“形式—意義—功能”——*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創刊號介紹，載方梅、史金生主編《互動語言學與漢語研究》(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
- 方迪 2023 投射、話輪構建與行為識解——以漢語評價序列為例，《當代語言學》第 2 期。
- 方梅 2016 再說“呢”——從互動角度看語氣詞的性質與功能，載《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研究

與探索(十八)》，1-18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方梅 2022 從副詞獨用現象看位置敏感與意義浮現，《中國語文》第 1 期。

方梅、胡蘇紅 2023 互動語言學研究的跨語言視角——以句法合作共建為例，《當代語言學》第 2 期。

方梅、謝心陽 2021 漢語對話中問句的解讀——以反問句和陳述式問句為例，《漢語學報》第 1 期。

方梅、李先銀、謝心陽 2018 互動語言學與互動視角的漢語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關越 2023 漢語自然口語對話中列舉表達的合作共建，《當代語言學》第 2 期。

關越、方梅 2020 漢語對話中的句法合作共建現象初探，《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李先銀、張文賢 2022 漢語自然口語對話中的否定疊連，《中國語文》第 3 期。

林燾 1962 現代漢語輕音和句法結構的關係，《中國語文》第 7 期。

陸鏡光 2000 句子成分的後置與話輪交替機制中的話輪後續手段，《中國語文》第 4 期。

陸鏡光 2002 在進行中的句子裏辨識句末，載徐烈炯、邵敬敏主編《漢語語法研究的新拓展(一)》，356-374 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陸鏡光 2004a 說延伸句，載《中國語文》編輯部編《慶祝〈中國語文〉創刊 50 周年學術論文集》，39-48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陸鏡光 2004b 延伸句的跨語言對比，《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6 期。

呂叔湘 1979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呂叔湘 2008 《語文常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喬雪瑋、樂耀 (將刊) 話語延伸及相關現象的研究述評及思考，《語言教學與研究》。

樂耀 2016 從交際互動角度看漢語會話的最佳話輪投射單位，載方梅主編《互動語言學與漢語研究》(第一輯)，49-71 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樂耀 2017a 漢語會話交際中的指稱調節，《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

樂耀 2017b 互動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會話交際的基本單位，《當代語言學》第 2 期。

樂耀 2019 交際互動、社會行為和對會話序列位置敏感的語法——《日常言談中的語法：如何構建回應行為》述評，《語言學論叢》（第六十輯），336-362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樂耀、喬雪瑋、鄭上鑫 2022 韻律作為互動的資源：以話語延伸和會話交疊為例，《中國語音學報》，第 17 輯，1-15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瑞祥 2023 互動視角的嘆詞研究，《當代語言學》，第 2 期。

朱德熙 1985 《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
Barth-Weingarten, Dagmar, Elisabeth Reber, and Margret Selting. 2010. *Prosody in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loomfield, Leonard. 1916. Subject and predicat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47:13-22.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呂叔湘節譯《漢語口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Chafe, Wallace L. (ed.). 1980.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Advances in Discourse Processes, Vol. III)*. Norwood, N.J.: Ablex

Couper-Kuhlen, Elizabeth. 2018. Finding a place for body movement in grammar.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51:1, 22-25.

Couper-Kuhlen, Elizabeth and Margret Selting. 2018.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ppermann, Arnulf and Alexandra Gubina. 2021. Positionally-sensitive action-ascription: Uses of Kannst du X? ‘Can you X?’ in their sequential and multimodal context.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1 (2): 183-215.

Deppermann, Arnulf, Lorenza Mondada and Simona Pekarek Doehler. 2021. Early Responses: An introduc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58(4): 293-307.

Dingemanse, Mark, Francisco Torreira, N. J. Enfield. 2013. Is “huh?” a universal word?

Convers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items. *PLoS (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ONE* 8(11): e78273.

Fox, Barbara A., Fay Wouk, Makoto Hayashi, Steven Fincke, Liang Tao, Marja-Leena Sorjonen, Minna Laakso, and Wilfrido Flores Hernandez. 2009. A cross-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site of initiation in same-turn self-repair. In Jack Sidnell (e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60-1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x, Barbara A. Fay Wouk, Steven Fincke, Wilfredo Hernandez Flores, Makoto Hayashi, Minna Laakso, Yael Maschler, Abolghasem Mehrabi, Marja-Leena Sorjonen, Susanne Uhmman and Hyun Jung Yang. 2017. Morphological self-repair: Self-repair within the word. *Studies in Language* 41(3): 638-659.

Garfinkel, Harold. 1963.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concerted stable actions. In O. J. Harvey (ed.),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87-238. New York: Ronald Press.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Hayashi, Makoto. 2005. Joint turn construction through language and the body: Notes on embodiment in coordinated participation in situated activities. *Semiotica*, 2005(156): 21-53.

Heritage, John.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eevallik, Leelo. 2018. What does embodied interaction tell us about grammar?.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51(1): 1-21.

Lerner, Gene H. 1991. On the syntax of sentences-in-progress. *Language in Society* 20(3): 441-458.

Li, Xiaoting and Tsuyoshi Ono (eds.). 2019. *Multimodality in Chinese Interaction*. Berlin: de Gruyter.

Luke, Kang-kwong. 2012. Dislocation or afterthought? A conversation analytic account of incremental sentences in Chinese. *Discourse Processes* 49(3-4): 338-365.

- Luke, Kang-kwong and Wei Zhang. 2007. Retrospective turn contin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conversation. *Pragmatics* 17(4): 605-635.
- Luke, Kang-kwong and Hiroko Tanaka, 2016. Constructing agreements with assessment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00: 25-39.
- Mayes, Patricia and Hongyin Tao. 2019. Referring expressions in categorizing activities: Rethinking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units for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43(2): 329-363.
- Mondada, Lorenza. 2013. The conversation analytic approach to data collection. In Jack Sidnell and Tanya Stiver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32-56.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 Mushin, Ilana and Simona Pekarek Doehler. 2021.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Moving temporality to the forefront of a science of language.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1(1): 2-32.
- Ochs, Elinor,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1996.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arek Doehler, Simona, Leelo Keevallik and Xiaoting Li. 2022. Editorial: The grammar-body interface in social interaction. *Frontier of Psychology* 13:875696.
- Rossi, Giovanni. 2020. Other-repetition in conversation across languages: Bringing prosody into pragmatic typology. *Language in Society* 49(4): 495-520.
- Sacks, Harvey. 1984. On doing being ordinary, In J. Maxwell Atkinson and John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413-4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Sandra A. 2019. Understanding “clause” as an emergent “unit”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43(2): 254-280.
- Thompson, Sandra A. and Elizabeth Couper-Kuhlen. 2005. The clause as a locus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7(4-5): 481-505.
- Thompson, Sandra A., Barbara A. Fox, and Elizabeth Couper-Kuhlen. 2015. *Grammar in Everyday Talk: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o, Hongyin. 2022. Scalar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A multimodal approach, *Lingua*, 266:103-202.

方梅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fangmei@cass.org.cn

樂耀 廈門 廈門大學中文系 yueyao82@163.com

方迪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fangdi@cass.org.cn